

唐代枢密使考略

李 鸿 宾

中唐以后，宦官成为左右中枢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已为世人所知。至于宦官如何干预朝政，尤其是其中的“四贵”（两中尉、两枢密使）专权弄势导致政局的变化，则是历来学人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唐代枢密使一职及其发展始末作一考索，不当之处，尚请不吝赐教。

一、枢密使职的出现

“枢密”一词在唐朝多指专掌重要机务的官职，例如中书令，其职是“典司枢密”（《旧唐书·代宗纪》），如宰相姚崇和卢怀慎就“对掌枢密”（《旧唐书·卢怀慎传》）；或者官卑而职要者如苏环、苏颋父子，亦可称为枢密。^①开元中，宰相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其中有“枢机房”，辅助宰相处理机要，算是枢密机构的雏形。

以宦官为枢密使一职的正式出现，史籍上众说不一。宋人孙光宪谓安史乱后枢密与观军容、处置和宣徽诸使并置；叶梦得进一步指实最早始于代宗永泰年间。按《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云：代宗“永泰二年（766），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

《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亦云“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又《通鉴》卷224代宗大历元年条“宦官董秀掌枢密”后注云：“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考诸《册府元龟》：“宪宗元和

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同上）这是笔者所见唐代枢密使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而在此前，我们所见仅是“枢密”、“入掌枢密”，或者干脆称“内侍”、“中人”、“中官”等等，说明当时尚无枢密使的正式设置。至于宋人提及枢密使多言及代宗朝董秀一事，则属概略之说或将枢密使与枢密混为一谈，并不确切。

枢密使始设于宪宗何年？《册府元龟》并没有确指。《旧唐书》卷138《李吉甫传》云：“宪宗初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暱善。”刘曾参与拥立宪宗，他的入知枢密使，当是宪宗对他的酬报。据此推测，则唐代枢密使的最早设置，是在宪宗元和元年（806）。与刘光琦同为使的梁守谦，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是在元和七年（812）。《通鉴》卷239元和七年条记载李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云云，则可确知梁仕枢密使职至迟也在七年之前。因此，《册府元龟》所谓始置枢密使二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宪宗上台后正式置枢密使以赏刘光琦，不久又设另一使，以梁守谦充任，遂成二员制额。

二、枢密使机构的建置及职能

唐代枢密使办公处所，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与枢使职务颇不相协。但就是这小小的“三楹舍”却握有上传圣旨、下达王命之权。唐代枢密机构所居之处，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9记云：“国初循唐旧制，置（枢密）院于中省之北。”又《新唐书·宦者下》：“诏如大中故事，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案前受事。”枢使候旨延英殿内，朝夕侍侧，其机构自应在离此处不远的中书省之北。又《铁围山丛谈》卷1记述唐制，“北门学士在内朝枢密使班，遇天子寿节，学士、待制自从枢密院先启建道场，罢散花宴”。文中北门学士即指翰林学士，唐置翰林院于大明宫

内右银台门之内，麟德殿西重廊后，同处班内的枢密机构自应亦在右银台门之北了。

唐枢密使办事机构除有正使外，其属员甚少，这恐怕与其尚未转成外官有直接关系。据笔者所查，枢使属下仅见一例。《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在描述唐中叶宦官代替外官主事时曾提及“枢密承旨”一职，又据《旧五代史》卷72《张居翰传》，张（系宦官）曾由容管监军判官转为学士院判官、枢密承旨、内府令等职，这已是唐末僖宗时期。据此推测，唐朝枢密使在创设时并没有属官，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及其权职的加强，枢使开始增加一些属员。宣宗朝以后，枢密机构扩大成使院，昭宗时期又一度发展为上下（或东西）二院。不过终唐一世，其属员与机构一样，尚未来得及发展与完善。枢密院机构不久被罢废，枢密使及属下大小宦官也被权臣朱温、崔胤一举消灭了。

唐代枢密使与后世比较起来，其职权范围表面上只是候旨殿廷，上承圣旨，下达中书门下。但实际上则要广泛得多。枢密使也正是凭借靠近皇帝这一特殊条件而逐步深入到中枢决策政权之中，只要事关皇廷和枢使自身利害的，他都有权过问，参与决策。特殊的职位，使枢密使创置之始就非同一般宦职，所以代宗将董秀召入宫内，就有宰臣僚吏与之巴结攀附；宣宗时，枢密使一经传旨，“或矫上旨谓未然，数改易挠权，”^②连宰相也惮其三分。懿宗刚上台，就有枢使、中尉索穿朝服的逼迫，力图取得与士僚同等的地位。僖宗朝任命枢密使干脆降白麻制如将相，懿宗朝的枢使杨复恭更是“堂状帖黄决事”，夺宰相之职，以至宦者“胯衫给事”，与朝臣同列执笏等等，最终形成宰相、枢密使“共参国政”的局面。随着局势的演变，枢密使的权限愈来愈超出原有的范围，甚至逾越中枢，危害整个政权和社会。

三、历任枢密使与中晚唐政局

自枢密使一职设置后，宦官位居要津遂成定制。中晚唐政局则因宦官势力的大肆介入而愈趋于错综复杂。笔者将唐代历任枢密使逐一爬梳考略，大致勾勒出其干权弄政的轨迹。

宪宗至文宗朝，是枢密使权力膨胀的第一时期。宪宗朝枢使刘光琦遇事与宰相相左，刘便到皇帝面前大发牢骚，结果“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③俨如宰中之宰。元和末年，政争转激，宪宗被梁守谦、王守澄等宦官杀害，首开枢使弑君之例。穆宗即位后，王守澄与魏弘简代替刘光琦、梁守谦入知枢密使。后魏因宰臣元稹败事牵连受贬，国政遂“专于守澄”。（《旧唐书·郑注传》）宝历二年（826）底，敬宗又被另外一批宦官杀害，王守澄与另一枢密使杨承和及两中尉将该势力除掉，拥立文宗上台。文宗一朝，宦官势力急速膨胀，不同派系的斗争及宦官与朝臣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文宗因王守澄肆威弄权，于是任用士人李训和宦官仇士良“使相糜肉”，《新唐书·宦者上》）此时王守澄升任中尉，枢职空缺，复补以西川监军王践言。太和九年（835），宰相宋申锡欲除宦官势力未果，反被贬职，与之关系密切的杨承和、王践言一同罢废，枢职又空。同年底，李训、郑注以甘露降，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往视之”。（《旧唐书·李训传》）此处的枢密使虽然不能确指，但杨、王被贬造成的空缺很快得以填补则是事实。说明枢职日渐重要，轻易不能阙员。

甘露之变未能除去宦祸，但自此后，枢密使一派势力有所收敛。这是因为神策军中尉权势遽胀，而外朝官在与宦官势力争权中又略占上风，此时是枢使与政局关系的第二时期。文宗末年，枢密使是刘弘逸和薛季稜，但刘、薛与当时的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关系不睦，双方矛盾激化，二中尉乘文宗病危之际将二枢使杀掉，并拥立武宗，枢使一职转由杨钦义和刘行深继任。杨、刘较

前任大有收敛，史称“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恣，不敢欲事”，^④加上武宗信赖宰相李德裕，朝政悉归其理，李德裕主张宦官不得干预军政，杨、刘亦无可奈何。

宣宗朝前期枢密使不著人名，据《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大中十一年（857）7月，以飞龙使兼宫闱局令王归长充任枢职。按《通鉴》早在此前的大中十年就曾提及枢密使是王归长和马公儒。^⑤可知王、马仕职应早于此。王、马与武宗朝的杨钦义、刘行深是唐代枢使中尚能谨慎从事、安分守己的宦官。这里除有其个人性格因素外，主要是受当时政局变化的制约。左军中尉马元贇因力主册立宣宗而倍受信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枢密使职权，而王归长、马公儒也在宣宗死后发生的政争中被杀。

懿宗朝枢密使宦官干政便突出起来，枢使与中尉“四贵”的身份较前似乎更为显赫。此为枢密使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枢职权力的再度膨胀，究其缘由，与懿宗即位有直接关系。宣宗本欲封立其子夔王李滋，但宦官王宗实违诏辅立郢王李漼，是为懿宗。懿宗立后，对不附己的朝臣大为不满，竟欲指使枢密使杨庆将该势力除掉。而枢密使便乘机扩大自身权势，所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⑥指的就是此时情景。当时除杨庆以外，另一枢使大概是杨玄翼。据《新唐书·宦者下》记载：杨复恭之宦父杨玄翼在咸通中任枢密使。考《旧唐书·宦官传》复恭接替杨玄翼知枢职是在咸通十年（869），则此前与杨庆同仕的应是杨玄翼。

唐僖宗一朝，正值农民大规模起义，朝廷内外混乱，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枢密使和中尉专权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之间争权夺利也愈演愈烈。僖宗初立，将小马坊使田令孜转为枢密使，与杨复恭共事。但田、杨关系极其复杂，田因杨之弟复光（亦为宦官）有战功而大为嫉恨，杨亦不满田之专横，“每事力争得失”，田于是趁杨复光出征战死之际将复恭出贬为飞龙使。但不久以后，杨复恭又东山再起：光启元年（885），朝廷因镇压农民起

义而致国用虚竭，军需品严重不足，田令孜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辖安邑、解县盐课收归神策军占有，此举引起王的极度不满。后田欲取代王重荣，王不奉诏，并联合沙陀李克用反叛。田又遣调邠宁节度使朱玖讨叛，朱旋即参与叛乱，逼迫僖宗逃离京城。田令孜因而惧怕，乃复引杨复恭入知枢密，自己则逃奔到西川避难去了。

与杨复恭同知枢职的另一位，据《通鉴》卷253僖宗广明元年条：该年5月，“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则知广明元年（880）5月前后的枢使分别是西门思恭和李顺融。^⑦后僖宗避王重荣、李克用之难，又以宦官严遵美为枢密使，这大概是僖宗朝最后一任了。^⑧

昭宗一朝，是唐代枢密使最为活跃、干政最为激烈，从而导致宦官与士僚仇雠不容的最后时期。枢密使与中尉内争外斗，左右政局，皇帝被挟持外出，成为多方争夺的囊中之物，又遭辱骂幽禁，诚如清人赵翼所讥“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⑨昭宗之立本得助于杨复恭，杨“恃援立功，所为多不法”。枢密使已经不满足于在内廷弄权预政，而急欲获得外廷朝官的身份地位。龙纪元年（889）底，昭宗郊祀圜丘，枢使与中尉强求穿戴士服，首开宦官服饰与外官相同之例。这也是枢密使逐渐由内官转向外官的趋势使然。据《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其时与杨复恭同为枢职的是骆全醴。又同书卷20上《昭宗纪》云，凤翔李茂贞借讨杨复恭之机，杀掉阻碍其问鼎的枢密使李周潼和段诩。李、段当是杨复恭与骆全醴下台后继任的。李、段被杀后，枢职又由康尚弼和骆全瓘二人填补。然而康尚弼在乾宁二年（895）又死于邠州节度使王行瑜之手。当时王曾谋取尚书令一职和隶属神策军的良原镇，均被宦官所阻。王于是联合李茂贞、韩建等将兵入京城，迫使昭宗“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⑩另一使骆全瓘亦丧命于藩帅征战之中。此时，昭宗因京城大乱而奔逃在外，仓促之间又命薛王李知柔和枢密使刘光裕还

京制置。又《旧唐书·昭宗纪》记载乾宁四年（897）8月，韩建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王宅”，将昭宗亲属杀害。从上文可知，康尚弼、骆全瓚被杀以后的枢密使至少有刘光裕和刘季述二人。

光化元年（898），昭宗还京后，复用宦官宋道弼和景务修。

《旧唐书·昭宗纪》和《通鉴》卷262昭宗光化三年条记述宋、景二人直书其职是枢密使。崔胤在光化二年所上奏章称“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旧唐书·宦官传》）当指宋、景二人而言。此后，任枢职的是王彦范和薛齐偓。但王、薛知枢使不足五个月就与两军中尉刘季述、王奉先一起被诛杀。当时昭宗既恐惧外藩的争强挟持，又愤于内枢的专权擅政，史称：“帝自华还宫后，颇以禽酒肆志，喜怒不常，自宋道弼等得罪，黄门尤惧。”（《旧唐书·昭宗纪》）光化三年（900）11月，刘季述率军发动政变，面数昭宗之罪，将昭宗废禁少阳院，又矫诏迎立皇太子监国，但此举遭到权臣崔胤及朝野其他势力的反对。崔胤联合朱温等乘机将刘季述一干宦官除掉，其中就包括王、薛二人。

昭宗复位后，又起用袁易简、周敬容入知枢使。另据《新唐书·宦者下》记云：“韩全海、张彦弘……并监凤翔军。全海入为内枢密使。”复据《通鉴》卷262昭宗天复元年条所记，刘季述、王仲先死后，又以枢密使韩全海、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中尉。则知韩全海亦在短小时内任过枢密使一职。

这个时期，唐代政治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雄居藩镇之冠的朱温、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⑩朝中官僚宦官亦因利害纷争而与藩帅结成不同之集团，互相攻讦，彼此争竞。中尉韩全海等与李茂贞相善，而宰相崔胤又与朱温聚结。天复元年（901）11月，李茂贞与宦官将昭宗挟往凤翔，朱温与崔胤联兵围攻凤翔，沙陀人李克用率军救助李茂贞，但未能奏效。至天

复三年，双方仍旧纷争不已，昭宗深恶“宦人胁迁”，怨憎李茂贞，“乃定计归全忠，以纾近祸”，^②而李茂贞面对朱温的紧逼，亦害怕自身实力丧失，遂归罪宦官，杀掉韩全海等人以谢朱温，枢密使袁易简和周敬容亦因此同时被杀。此后，昭宗虽然又任命王知古、杨虔朗为枢密，并将枢密机构分为上下（亦称东西）二院，但在昭宗一行返回长安后，崔胤与朱温就将京城大小宦官全部杀掉，昭宗亦被迫下诏正式废除枢密院，枢密使一职转归他人代理。

四、枢密使兴盛的原因

枢密使从候旨殿廷、传递诏令到上下其手、干预朝政，其兴盛与衰竭，与唐朝中后期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首先，枢密使是中唐政局演变的产物。宋人司马光在谈到宦官问题时说：“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豫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③司马光的这番话，尤其是他对唐朝宦官干政的具体过程的分析，是颇为中肯的。自从武则天改制以后，唐代前期的各种制度已出现新的转变趋势，到玄宗一朝，整个社会也面临着新旧的交替，安史叛乱进一步促使社会矛盾突出而尖锐。朝官擅权，武将专横，藩镇跋扈，经过安史之乱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唐代君主周边无靠，便将其视线转移到宦官身上。玄宗信宠高力士，自谓有力士侍佐，其睡寝亦安。而李辅国又在危难中协助肃宗另立，于是继其踵后，程元振、鱼朝恩以及窦文场、霍仙鸣这类人物便相继登台。德宗在经历蒙难之后，

嘱意宦官掌握神策军，首开唐朝宦官掌握军权之先。到宪宗上台，便又开设枢密使，用宦官参与中枢决策，从而形成宦官内预朝政，外握兵权之局面。

其次，枢密使在唐代后期政治中由一般地位升至“四贵”，居宦官势力之巅，还得助于枢密使自身的特殊条件。如前所述，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⑭这使他有机会参预国家中枢机务与决策。如果说神策军中尉猖肆的资本是握有兵权，那么枢密使则是以其职权之便逐步深入决策部门之内。《旧唐书》卷165《温造传》记述文宗大和二年（828），大明宫昭德寺突起大火，“火势将及，宰臣、两省、京兆尹、中尉、枢密，皆环立于日华门外，令神策兵士救之。”火灾原因及善后处理我们姑置不论，此处以枢密使与宰臣等相提并论，可以看出至少在文宗时，枢密使的地位就几乎与宰相平起平坐了。虽然唐朝枢使与中尉同居禁内，在名次上中尉位居枢使之上，但枢使以其传送诏旨接近皇帝，比中尉更有机会弄权，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枢使的实际权限反在中尉之上。如前引《新唐书·宦者下》所云延英奏事，枢密使虽则案前受旨传递诏令，但在传送中更改诏文，或直接奏事，甚至与宰相一同帷幄决策，进而发展到废君立主，决定朝祚，所有这一切，均得之其传旨的特殊条件。

第三，隐藏在枢密使兴盛背后的因素，还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特点所决定的。自西汉中期起，汉武帝开始任用内朝亲信参预机要，行使权力。以尚书为代表的内官始得染指政权，后又有中书、门下等官职的继起，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这些内朝官取代原来的外官三公九卿而成为王朝的正式官职。一旦如此，他们原来与皇帝保持的那种亲密关系也就宣告结束。而在皇帝周围，又以各种方式聚结不同的亲信形成新的权势网络。在唐朝，三省制确立不久，便出现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一类的职号，行使宰相之权，

中期以后，三省机构遭到破坏，原来的宰相职权渐失，内朝宦官及佞幸之辈便乘机而起，大有取代朝官行掌其权之势。这种变化在唐中期固然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皇权与相权之间既依赖又矛盾斗争的反映。皇帝依靠宰相治理国家，但又惧怕宰相过分揽权，于是便以重用亲信方式分解相权，甚至将其架空，而皇帝依宠的内官一旦成为外官，原有的关系便被君相关系所取代，结果又是矛盾、倾轧的重现。枢密使的兴起与发展，正好处在唐朝内官势力代替外官的转化阶段，所以德宗以宦官掌握禁卫军权，而宪宗以宦官参预政权，便成为当时一种自然的选择。尽管宦官势力在唐朝末年被朱温、崔胤联合消灭，但枢密使一职及其机构并未因此而废，相反，在五代数十年的历史中得到发展，以至成为封建国家的正式中枢决策机构，这也正是适应了封建政权结构内部变化的特点。

注：

- ①见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宋王谠：《唐语林》卷2。 ②⑫见《新唐书》卷208《宦者下》。 ③见《通鉴》卷237宪宗元和元年条。 ④见《通鉴》卷247武宗会昌3年条。 ⑤见《通鉴》卷249宣宗大中10年条，《唐语林》卷1。 ⑥见《通鉴》卷250懿宗咸通2年条。 ⑦此间杨复光亦曾为枢密使，见《通鉴》卷254僖宗中和元年条。 ⑧黄巢农民军所建大齐政权也仿唐制设置枢密使二人，与宰相、中尉等构成农民军政权体制。不过此二人均为士人（费传古，李说），打破唐朝惯制，为五代枢密使士人任职开创先例。 ⑨⑭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 ⑩见《通鉴》卷260昭宗乾宁2年条。 ⑪见《通鉴》卷262昭宗天复元年条。 ⑬见《通鉴》卷263昭宗天复3年条。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